

县中发展困境中的 县域家庭高中选择误区与理性决策^{*}

郭丛斌 游振磊 吴宇川

[摘要] 县域普通高中是促进县域人力资本积累与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的重要支点。然而,许多县域家庭容易陷入学校选择决策误区,盲目择校到地市级高中,造成县域普通高中优质生源流失的加剧,不利于“县中振兴”目标的实现。基于对J省高中生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县域生源学生的择校效果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域普通高中在平均意义上更有利于促进学业进步。其中,留在县域普通高中对县域生源学生的积极影响主要发生在相对优势家庭与文科学生群体中。此外,择校带来的教育环境变化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消极作用,“大鱼小池塘效应”的存在与父母陪伴减少是消极作用产生的两种主要原因。为引导县域家庭走出误区、理性决策,遏制县域普通高中优质生源的持续流失,可从增加资源投入、影响大众认知、优化学校评价、规范招生秩序、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家校协同等方面着力。

[关键词] 县域普通高中;择校;学业成就;“大鱼小池塘效应”;父母陪伴

[作者简介] 郭丛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游振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吴宇川,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通信作者:ycwu@pku.edu.cn 北京 100871)

高中教育作为连接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关系到弱势群体的代际流动,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工程之一。县域普通高中(以下简称县中)作为我国高中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是促进县域人力资本积累与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的重要支点。加强县中建设,提升县中教育质量,不仅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教育扶贫成果的巩固,而且能对社会的代际流动及和谐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近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要加强县中建设;2025年9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城乡普通高中教育协调发展,促进县中振兴”。尽管国家一直对县中建设非常重视,但是,由于城镇化的加速与“超级中学”的崛起,县中的高考表现、社会口碑与地市级高中仍存在较大的差距。^[1]

县中发展困境与优质生源的流失密切相关。在县中走向衰弱的过程中,县域家长为了让子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会主动在县域之外谋求择校,^[2]择校目标通常是高考表现更好的地市级高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择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24年度青年项目“集团化办学对县域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与机制研究”(编号:24YJC880146)的研究成果。

校现象,可能是因为县域家庭陷入了“好学校带来好成绩”的决策误区,将地市级高中优异的高考表现简单归因于前者更高的教育质量。对于县中而言,择校导致的优质生源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县中高考表现的下滑。^[3]“学校高考表现差—家长失去信心—生源流失—学校高考表现持续变差”的恶性循环由此产生。避免优质生源流失成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关键与解决县中发展困境的突破口。^[4]留在县中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究竟哪种学校选择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业进步?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在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人口迁移流动日益活跃的时空格局下,帮助县域家庭作出理性的学校选择,对实现“县中振兴”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重塑大众对县中的信心,引导县域家庭作出理性的学校选择,需要明确县域家庭的学校选择决策逻辑。

在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县域家庭往往倾向选择那些高考表现更优异的地市级高中。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大众化、普及化,“上好高中才能上好大学,上好大学才能找好工作”成为普通家庭典型的教育选择思路。基于顶尖大学生源数据的分析显示,尽管县中在校生规模庞大,但其学生考入顶尖大学的比例相较地市级高中低得多。^[5]这种反差强化了县域家长和学生选择地市级高中的倾向。多项研究结果显示,中考成绩相对优异的县域学生在高中阶段有向地市级高中流动的趋势。^[6]

然而,择校到“好学校”与取得“好成绩”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县域家长朴素地认为,择校到高考表现更好的高中有助于提升子女的学业成就,即存在“好学校带来好成绩”的认知,但证实择校行为与学生学业进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见。

有研究者发现,相比在第二梯队的高中做“鸡头”,勉强进入第一梯队高中的“凤尾”学生更可能面临成绩损失,^[7]且择校会显著降低学生语数外三门学科的总成绩^[8]。与国内研究类似,国外实证研究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择校可以从普遍意义上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仅有少数研究发现,择校确实有助于特定群体(如非洲裔学生)提高成绩。^[9]

县域家庭倾向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可能是陷入了“好学校带来好成绩”的学校选择决策误区。一方面,县域家长可能将学生的学业成就简单地归因于学校因素。事实上,教育生产函数理论认为,包括学业基础在内的学生个体、家庭、学校因素均可以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10]县域家长在比较县、市高中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时可能未排除学业基础、家庭因素的干扰,容易高估地市级高中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县域家长还可能只片面地认识到择校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了择校带来的教育环境变化对学生学业成就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

(一) 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

将学生的学业成就简单归因于学校的教育质量,是县域家庭倾向于择校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学生在高中阶段的成绩既可能受到学校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学生个体的学业基础即生源质量,以及学生家庭因素的影响。在将学生的学业成就归因于学校因素或学校选择因素之前,需要先剥离非学校影响因素的干扰。^[11]

实证研究显示,在剥离非学校因素的影响之后,学校因素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净效应并不高。早在1966年,《科尔曼报告》(*The Coleman Report*)便指出,学校的教育资源投入并非影响学生考试成绩的首要因素。^[12]基于中国数据的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精英高中”、重点高中等“好学校”中,学生优异的学业成就更多依靠生源筛选而非学校的教学、管理。^[13]研究显示,虽然重点高中确实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学生成绩,但决定高考成绩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的认知能力、^[14]学习能力和高中前的学业基础^[15]。针对我国不同省市开展的实证研究并未发现就读重点高中对学生高考成绩的显著影响,^[16]尤其是中考成绩在“精英高中”录取线附近的学生,是否就读“精英高中”并不会影响其高考成绩^[17]。

“好学校”之所以未必带来“好成绩”,是因为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因素繁多且复杂。在我国,家庭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竞争通常依赖分数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即“好学校”通过设定考试分数标准(通常为中考成绩)筛选“好学生”。“好学生”可能在学业基础、家庭背景等方面显著优于同龄人,而这也是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18]因此,直接比较地市级高中与县中学生的高考成绩会产生自选择偏误,难以准确评估两类高中在提升学生学业成就方面的作用。

(二) 择校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县域家庭作出择校决策,主要希望择校能促进学生学业进步。然而,县域家庭在决策过程中也容易忽略择校带来的教育环境变化对学生学业成就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即择校到好学校不仅未必能带来“好成绩”,还可能造成“差成绩”。

消极作用产生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存在“大鱼小池塘效应”。狭义的“大鱼小池塘效应”是教育心理学中的概念,指学业基础较好的学生在进入相对水平较高的学校或班级后出现心理落差,呈现较低的学业自我概念。^[19]所谓学业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学业情境中形成的对自己在学业发展方面比较稳定的认知、体验和自我评价。^[20]学生从普通学校进入好学校后,社会比较所需要的参照系发生变化,可能出现心理落差、学业自我概念降低、自我感觉“技不如人”等情况。多数实证和元分析研究均表明,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业成就相互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21]除了上述心理机制,广义的“大鱼小池塘效应”还包括

学业基础较好的学生在进入相对水平较高的学校或班级后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减少现象。一般认为,在学校或班级中,学业表现相对优秀的学生更容易获得教师的关注与重视,也有更多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22]如果勉强进入更高水平的学校,则显得不再那么“优秀”,个人所能获得的教师关注与教育资源也可能不及从前^[23]。

择校消极作用的另一个潜在原因与由县到市异地择校所造成的父母陪伴减少有关。有研究指出,家庭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要比学校因素大得多,^[24]父母陪伴作为后致性家庭教育投入因素对学生学业发展有重要作用^[25]。高质量的父母陪伴可以有效培养子女的自律能力,^[26]引导其学习态度,^[27]并为其提供情感支持^[28];而异地择校所造成的父母陪伴减少不仅不利于子女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而且会减少父母对子女的学习监督,削弱父母对子女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29]。许多实证研究亦从留守儿童、寄宿学生视角切入,间接强调了父母陪伴缺失对学生学业成就的不良影响。^[30]

然而,过往择校效果评估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限于数据收集的难度,学业基础这一对学生学业成就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在择校分析中常被遗漏,导致目标学校筛选生源的效果被掩盖,教育质量被高估,学生学业成就被简单归因于学校。第二,过往研究在评估择校效果时,主要关注目标学校本身对学业成就的作用,而忽略了择校带来的教育环境变化对学生学业成就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研究综合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在剥离学业基础、性别等学生个体因素,以及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家庭因素干扰的基础上,比较留在县中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的学校选择对县域生源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并检验择校带来的教育环境变化是否对学生学业成就产生消极作用。本研究可为我国的择校研究提供县市比较视角的经验证

据,帮助县域家庭走出学校选择误区、进行理性决策,进而遏制县中优质生源的持续流失。

二、研究设计

在评估学校选择对县域生源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时,本研究对已有研究的两方面不足进行针对性弥补,以保证评估的准确性。首先,构建包含学生个体、家庭、学校因素的教育生产函数增值模型;其次,通过分样本回归探索学校选择效果在不同县域生源学生群体中的异质性;最后,借助设置交互项、两步回归法等方式检验择校消极作用的两个潜在原因。

(一) 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大数据中心2022年对我国J省高中生的问卷调查。该调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在J省11个地级市中抽取6个地级市,并在每个地级市抽取1~2所位于城区的地市级高中、1~2所位于该地级市下辖县或县级市的县中发放问卷。调查收集了县域生源高三学生的家庭背景、个体特征等信息,且在2022年高考之后,研究人员还通过当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中,对学生的中高考成绩进行了逐一追踪、核对与匹配。

与以往相关研究所用数据相比,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更具代表性与稀缺性。一方面,J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生产总值处于全国各省中游,其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式获得,学生的家庭背景、个体特征、中高考成绩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另一方面,数据中的中高考成绩信息来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中,而非学生的自我回忆与汇报,准确性与可信度较高;家庭背景、个体特征信息与中高考成绩的匹配使用为本研究排除个体、家庭因素,计算学校选择对学生学

业成就影响的净效应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有效避免了既往研究因中考成绩这一重要变量遗漏所导致的计量回归偏误问题。

剔除异常值和缺失值后,本研究共得到1685名2022届县域生源学生的有效样本数据。其中,选择留在县中的学生有1225名,择校到地市级高中的学生有460名,二者分别占有效样本容量的比例为72.7%与27.3%。样本分布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县域生源学生样本分布情况

样本划分维度	子样本类别	样本容量	样本占比(%)
学校选择	留在县中	1 225	72.7
	择校到地市级高中	460	27.3
父母职业	非管理技术类职业	1 332	79.0
	管理技术类职业	353	21.0
父母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 395	82.8
	大专及以上	290	17.2
户籍	农村	1 147	68.0
	城镇	538	32.0
性别	女性	804	47.7
	男性	881	52.3
选科	文科	526	31.2
	理科	1 159	68.8

注:本研究中,“管理技术类职业”指行政管理人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技术辅助人员、一般管理及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非管理技术类职业”指个体户、农(林牧渔)民、工人(生产运输设备等)、进城务工人员、无业人员。2022年J省高考尚未实施综合改革,仍实行文理分科制。

(二) 变量选取与测量

1. 因变量:成绩增值

本研究用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业成就的数据。第一,不论是高中入学还是高校招生,仍主要依赖标准化考试的成绩;第二,现阶段中国家长在进行高中学校选择时最为看重的仍是考试成绩,尤其是高考成绩这一显性指标;第三,在教育生产函数分析中使用考试成绩衡量教育产出是教育定量研究领域的国际通行做法,方便不同研究的对比。鉴于此,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31]以学生高中阶段的考试成绩增值作为因变量,衡量学生

的学业成就提升程度即学业进步水平。

将成绩增值作为因变量,本质上是对学业基础(前测成绩)进行控制,其根本目的是在评估学校选择效果时排除学业基础这一个体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干扰,针对性地弥补已有研究的第一项不足。首先,学业基础一定程度上表征学生的能力、学习态度。以成绩增值作为因变量,可以控制学生的能力、学习态度等难以测量的变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减少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其次,普通高中的录取过程通常是不同层级学校的生源筛选过程,以成绩增值作为因变量,可以纠正生源筛选造成的对地市级高中教育质量的高估。再次,学业基础可能影响各类教育投入。例如,学校可能根据中考成绩对学生进行分层教学并匹配不同的教育资源,控制学业基础可以避免此类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

具体变量构建上,将高考与中考成绩相减是计算高中阶段成绩增值的一种直观方法,但是,由于高考与中考在科目及分值设置、考试内容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能直接类比。因此,需要先将中高考成绩进行标准化处理。变量计算方法如下。

$$\Delta Z_i = \frac{H_i - \bar{H}}{S_h} - \frac{M_i - \bar{M}}{S_m}$$

其中, H_i 和 M_i 分别表示学生*i*的高考和中考原始分, \bar{H} 和 \bar{M} 分别表示两次考试的平均分, S_h 和 S_m 分别为两次考试的标准差。原始分与平均分之差再除以标准差即为标准分。 ΔZ_i 是高考成绩标准分与中考成绩标准分之差,即成绩增值,衡量学生*i*在高中阶段的学业进步水平。

2. 核心自变量:学校选择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学校选择虚拟变量,用于识别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中还是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如果就读于县中,则该变量取值为1;如果就读于地市级高中,则取值为0。县中指学校主校区的地理位置位于县或县级市的普通高中,地市级高中指学校

主校区的地理位置位于地级市市辖区的普通高中。

3. 控制变量

第一类控制变量为家庭背景变量,包括父母职业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无论是职业还是受教育程度,均以父母双方职业地位或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情况为准。第二类控制变量为学生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户籍、性别,以及文理分科中的选科情况,均为虚拟变量。

(三)计量模型

为估计县域生源学生学校选择对学业进步的影响,建立如下教育生产函数增值模型(1):

$$Y_{ij} = \alpha_0 + \alpha_1 C_{ij} + \theta_1 F_{ij} + \theta_2 I_{ij} + \varepsilon_{ij} \quad (1)$$

其中,角标*j*代表学校,*i*代表学生;因变量 Y_{ij} 为学校*j*学生*i*的成绩增值;自变量 C_{ij} 为学校选择虚拟变量,即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控制变量 F_{ij} 、 I_{ij} 分别表示家庭背景变量与学生个体特征变量。 ε_{ij} 表示随机误差。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验证模型(1)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该方法中倾向性得分计算模型为模型(2),采用Logit模型形式,各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相同:

$$Logit(C_{ij}) = \alpha_0 + \theta_1 F_{ij} + \theta_2 I_{ij} + \varepsilon_{ij} \quad (2)$$

为针对性地检验择校对学生学业成就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本研究拟检验择校消极作用的两个潜在原因。

首先,检验县域生源学生由县到市的异地择校是否存在“大鱼小池塘效应”。本研究建立模型(3)如下:

$$GK_{ij} = \alpha_0 + \alpha_1 C_{ij} + \alpha_2 C_{ij} \times ZK_{ij} + \alpha_3 ZK_{ij} + \theta_1 F_{ij} + \theta_2 I_{ij} + \varepsilon_{ij} \quad (3)$$

其中, GK_{ij} 表示学校*j*学生*i*的高考成绩标准分, ZK_{ij} 则为学生的中考成绩标准分,其余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相同。“大鱼小池塘效应”表现为学业基础较好的学生在进入相对水平较高的学校后成绩下降。因此,如果学校选择变量与中考成绩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显著大于0,说明随着学生学业基础的提高,留在县中更有助于学生高考成绩的提升。换句话说,择校到地市级高中不利于成绩提升,即“大鱼小池塘效应”存在。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的因变量之所以是高考成绩标准分而不是成绩增值,是因为后者是由高考成绩标准分减去中考成绩标准分计算得到的;若以成绩增值作为因变量,则中考成绩标准分在模型的左右两侧都会出现,这将导致模型回归出现完全多重共线性问题。

其次,检验县域生源学生由县到市异地择校后学业成就是否会受父母陪伴减少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两步回归法进行机制分析,具体模型见模型(4)、(5):

$$P_{ij} = \beta_0 + \beta_1 C_{ij} + \theta_1 F_{ij} + \theta_2 I_{ij} + \varepsilon_{ij} \quad (4)$$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或计算方法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成绩增值	高考成绩标准分—中考成绩标准分	-2.96	2.61	0.00	0.64
高考成绩标准分	(高考原始分—高考平均分)/高考标准差	-2.69	1.77	0.00	1.00
中考成绩标准分	(中考原始分—中考平均分)/中考标准差	-2.27	1.84	0.00	1.00
学校选择	留在县中=1,择校到地市级高中=0	0	1	0.73	0.45
父母职业	管理技术类职业=1,非管理技术类职业=0	0	1	0.21	0.41
父母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1,高中及以下=0	0	1	0.17	0.38
户籍	城镇=1,农村=0	0	1	0.32	0.47
性别	男性=1,女性=0	0	1	0.52	0.50
选科	理科=1,文科=0	0	1	0.69	0.46
父母陪伴	父母至少一方与子女生活=1,子女独自生活=0	0	1	0.82	0.39

三、实证分析结果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主要围绕四个具体问题展开。一是县中与地市级高中的县域生源学生在家庭背景、个体特征、学业成就等方面存在怎样的特征差异;二是学校选择对县域生源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怎样的影响;三是学校选择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在不同县域生源学生群体中是否具有异质性;四是“大鱼小池塘效应”与父母陪伴减少是否影响县域生源学生异地择校的效果。

$$Y_{ij} = \beta_0 + \beta_1 C_{ij} + \beta_2 P_{ij} + \theta_1 F_{ij} + \theta_2 I_{ij} + \varepsilon_{ij} \quad (5)$$

第一步,检验县域生源学生择校与父母陪伴的关系,采用模型(4)进行分析;第二步,同时检验县域生源学生择校、父母陪伴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采用模型(5)进行分析。其中, P_{ij} 为父母陪伴变量,衡量学校j学生i所在家庭的父母陪伴情况: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与学生一同生活时取值为1,父母双方均不在学生身边时取值为0。其余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相同。如果第一步回归中学校选择变量的回归系数与第二步回归中父母陪伴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异地择校可以通过影响父母陪伴的路径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各模型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见表2。

(一)两类高中县域生源学生的特征差

异明显

为了从整体上对县中与地市级高中的县域生源学生特征进行概览,本研究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3)

从家庭背景看,县中组县域生源学生父母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比例为21.7%,父母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为11.3%,明显低于地市级高中组县域生源学生的46.3%和33.0%,表明县中组县域生源学生在家庭背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既往研究指出,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方有能力帮助子女择

表3

两类高中县域生源学生的特征

变量		县中(A)	地市级高中(B)	差值(A-B)
中考成绩(标准分)		-0.400	1.066	-1.466
高考成绩(标准分)		-0.346	0.922	-1.268
成绩增值(标准分)		0.054	-0.144	0.198
父母职业(%)	非管理技术类职业	78.3	53.7	24.6
	管理技术类职业	21.7	46.3	-24.6
父母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88.7	67.0	21.8
	大专及以上	11.3	33.0	-21.8
户籍(%)	农村	77.2	43.7	33.5
	城镇	22.8	56.3	-33.5
性别(%)	女性	49.8	42.2	7.6
	男性	50.2	57.8	-7.6
选科(%)	文科	37.9	13.5	24.4
	理科	62.1	86.5	-24.4

校,[32]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优势的学生群体集中于资源较好的学校[33]。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同样验证了相对优势家庭的择校倾向与择校能力。

从个体特征来看,县中组县域生源学生中,农村户籍占比为77.2%,女性占比为49.8%,文科学生成占比为37.9%,均高于地市级高中组的县域生源学生。

从学业成就来看,县中组县域生源学生的平均中考成绩较地市级高中组低1.466个标准分,平均高考成绩低1.268个标准分,说明学业基础好的县域生源学生更有可能择校到地市级高中,且地市级高中的县域生源学生有着更好的高考成绩。但是,县中组的平均成绩增值为0.054个标准分,而地市级高中组的成绩增值却为-0.144个标准分,说明从增值评价的角度而言,经过高中三年的学习,县中组的学生取得了更大的学业进步。

为呈现学生的学业成就分化情况,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成绩优秀学生^①的分布。据统计,县中只有5.4%的县域生源学生中考成绩优秀,却有17.4%的学生高中期间成绩增值优秀;而地市级高中县域生源学生虽有

62.0%的中考成绩优秀率,却只有7.6%的成绩增值优秀率。这意味着,在学业进步方面,县中的县域生源学生总体表现优于地市级高中的县域生源学生。

由于描述统计的分析过程没有同时控制学校、家庭、个体三个层面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的因素,因此,比较不同学校选择对县域生源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还有赖于进一步的计量回归分析。

(二) 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中更能促进学业发展

在不考虑样本选择偏误的情况下,首先基于模型(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基准分析。如表4所示,除核心自变量学校选择外,回归(1)不控制其他变量。结果显示,相较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留在县中的县域生源学生成绩增值水平高0.199个标准分。回归(2)、(3)在回归(1)的基础上逐步引入了家庭背景变量与学生个体特征变量,核心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数值虽然有所减小但仍然显著大于0。这意味着,平均而言,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中更能促进学业发展。此外,回归(2)、(3)中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0.193、

^① 根据样本分布,将中考成绩超出所在群组均值1个标准差的学生定义为中考成绩优秀学生,将中高考成绩增值超出所在群组均值1个标准差的学生定义为高中期间成绩增值优秀学生。

0.081较回归(1)的0.199有一定幅度减小,说明回归(1)在对学校选择效果进行评估时混杂了家庭、学生个体因素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表4

学校选择对学业进步的影响以及各变量对学校选择的影响

变量	成绩增值(1)	成绩增值(2)	成绩增值(3)	学校选择(4)
学校选择 (留在县中=1,择校到地市级高中=0)	0.199*** (0.032)	0.193*** (0.034)	0.081** (0.035)	
父母职业		-0.001 (0.049)	0.006 (0.048)	-0.444** (0.185)
父母受教育程度		-0.024 (0.054)	0.018 (0.053)	-0.315 (0.198)
选科			-0.449*** (0.034)	-1.409*** (0.164)
户籍			-0.055 (0.037)	-1.172*** (0.141)
性别			0.061* (0.032)	0.144 (0.128)
N	1 685	1 685	1 685	1 685
R ² 或Pseudo R ²	0.019	0.019	0.110	0.142

注:回归(1)、(2)、(3)基于模型(1),因变量为成绩增值,回归(4)基于模型(2),因变量为学校选择;*、**、***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个体获得何种高中教育机会并非随机事件,通常会受到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若仅采用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就有可能产生选择偏误问题。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验证前述基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该方法依据倾向性得分对就读于县中与地市级高中的县域生源学生进行匹配,本质上是对各种混杂因素进行类似随机化的均衡处理以减少样本选择偏误。首先,以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选科、户籍、性别等变量为自变量,以学校选择为因变量进行Logit模型回归,计算各县域生源学生的倾向性得分值,回归结果见表4中的回归(4)。其次,采用K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卡尺内K近邻匹配、核匹配等四种方法对两类高中的县域生源学生进行匹配,并对匹配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两类学校样本在绝大多数倾向性得分区间均存在重叠,匹配样本基本满足重叠性假设;所有协变量匹配

如果希望正确评估学校选择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净效应,就需要尽可能剥离相关混杂因素的干扰。

后的偏差均小于10%,且较匹配前大幅缩小,匹配质量较高。再次,计算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中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the Treated, ATT),即相较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留在县中平均能获得的更高成绩增值。结果如表5所示,四种匹配方法下ATT估计值分别为0.177、0.164、0.181、0.169,均显著大于0;各估计值较表4中回归(3)的结果,数值虽有增长,但方向保持一致。综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再次说明,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中更能促进学业发展。

(三)异质性分析

基准分析的结果证实,相较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中更有助于学业发展。但是,学校选择的作用可能因学生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个体特征而有差异。本研究在模型(1)的基础上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式探讨上述差异,为特定群体作出理性的学校选择决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实证依据。^①

① 鉴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是本研究的关注重点,后文不再详细汇报。

表5

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对学校选择作用的估计

匹配状态与匹配方法	成绩增值		ATT(A-B)
	县中(A)	地市级高中(B)	
匹配前	0.054	-0.144	0.199***
K近邻匹配(K=4)	0.054	-0.123	0.177***
半径匹配(r=0.01)	0.052	-0.112	0.164***
卡尺(r=0.01)内K近邻匹配(K=4)	0.052	-0.129	0.181***
核匹配	0.054	-0.115	0.169***

注: *、**、***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的水平下显著。

1. 留在县中更有助于相对优势家庭学生的学业发展

家庭背景在学生受教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父母的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往往决定了学生可以从家庭获得的学业支持。表6的回归(1)、(2)展示了按父母职业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其中,回归(1)中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0.138显著大于0,回归(2)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对于父母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学生群体而言,留在县中更能

促进学业发展,而对于父母从事非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学生群体,选择县中还是地市级高中没有显著差异。类似地,回归(3)、(4)展示了按父母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其中,回归(3)中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0.137显著大于0,回归(4)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对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学生群体而言,留在县中更能促进学业发展,而对父母仅有高中及以下学历背景的学生群体,选择哪类高中没有显著差异。

表6

不同家庭背景学生受学校选择的影响

变量	管理技术类职业(1)	非管理技术类职业(2)	大专及以上(3)	高中及以下(4)
学校选择 (留在县中=1,择校到地市级高中=0)	0.138** (0.057)	0.063 (0.043)	0.137** (0.066)	0.066 (0.040)
父母职业			是	是
父母受教育程度	是	是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353	1 332	290	1 395
R ²	0.117	0.112	0.082	0.114

注:本表所有回归基于模型(1),因变量为成绩增值;回归(1)、(2)基于父母职业的不同子样本,回归(3)、(4)基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子样本;*、**、***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父母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县域生源学生群体选择县中之所以可以获得幅度更大的学业进步,可能是因为此类学生的家庭背景在县域环境中更为突出——不论是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还是文化资本。一方面,这些资本让此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更容易在学校建立心理优势;^[34]另一方面,受“人情社会”因素的影响,

学校、教师也更有可能为家庭背景突出的学生分配更加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35]。

2. 留在县中更能促进文科学生学业发展

在本研究数据采集时点2022年,尚未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如J省)仍旧实行普通高中文理分科制度,学校因素对于文理科学生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如表7回归(1)所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留在县中更

能促进文科学生学业进步——平均而言,县域生源文科学生留在县中所能获得的成绩增值比择校到地市级高中高 0.404 个标准分。回归(2)中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意味着对县域生源理科学生而言,选择哪类高中没有显著差异。

表 7 文理科学生受学校选择的影响

变量	文科(1)	理科(2)
学校选择 (留在县中=1,择校到地市级高中=0)	0.404*** (0.063)	0.018 (0.039)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N	526	1 159
R ²	0.073	0.014

注:本表所有回归基于模型(1),因变量为成绩增值;回归(1)、(2)分别基于文科、理科学生子样本;*,**,***分别表示在 0.1、0.05 和 0.0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与理科学生相比,留在县中对县域生源文科学生的积极影响更大,其原因可能与两类高中的比较优势有关。在市场化的就业政策下,师范生与教师更倾向于选择高级别城市就业。^[36]有研究表明,理科学习较文科学习对优质师资的依赖性更强,地市级高中由于对优质师资的吸引力更大而在理科教学上具有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县中的比较优势则在文科教学。^[37]两类高中为增加教育产出,会优先将资源分配给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因此,文科学生在县中更有获得优质教育资源。^[38]与此同时,学校选择对理科学生学业进步影响不显著的回归结果也说明,即使地市级高中在理科教学上更具比较优势,县域生源学生异地择校对学业成就的消极作用也完全有可能抵消此种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开展高考综合改革省份的选科情况与传统高考的文理分科具有一定的相似度,上文基于文理分科的分析结论在已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亦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理由包括三方面。第一,目前全国已有 23 个采用“3+1+2”选科模式的高考

综合改革省份,即需要在历史、物理两个传统文理科目中二择一作为必考科目;第二,根据 2021 年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理工农医四大学科门类的 61 个专业类中,有 55 个要求必选物理与化学,占比超过 90%;第三,覆盖江苏、广东、重庆、河北等八省市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考综合改革制度实施后,2025 届学生同时选择物理、化学的比例高达 62.2%,^[39]与传统高考文理分科制度下理科学生的比例已非常接近^①。

(四) 择校消极作用的原因分析

县域生源学生择校到地市级高中不如留在县中,与择校带来的教育环境变化对学生学业成就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有关。这种消极作用可能由两个潜在原因引发:“大鱼小池塘效应”与父母陪伴减少。本研究使用模型(3)尝试分析学业基础与学校选择的交互效应,以检验“大鱼小池塘效应”;针对第二个潜在原因,本研究使用模型(4)、(5),采用两步回归法检验父母陪伴因素在异地择校与学生学业进步之间所发挥的作用。

1. 绩优生遭遇“大鱼小池塘效应”

“大鱼小池塘效应”的典型特征在于学业基础较好的学生(即绩优生)进入相对水平较高的学校后成绩下降。表 8 的回归(1)基于模型(3),以高考成绩标准分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中增加了中考成绩标准分,以及学校选择变量与中考成绩标准分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学校选择的回归系数 -0.376, 显著小于 0, 说明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条件下, 县中县域生源学生的高考成绩比地市级高中县域生源学生平均低 0.376 个标准分。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0.223 显著大于 0, 说明随着学生中考成绩(学业基础)的提高, 留在县中更有利学生高考成绩的提升, 而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则相对不利。“大鱼小池塘效应”得以验证。

① 根据八省教育考试院 2016 年公布的一分一段表,可计算出理科学生比例为 60.5%。

表8

择校对学业成就产生消极作用的原因检验

变量	高考成绩标准分(1)	父母陪伴(2)	成绩增值(3)
学校选择 (留在县中=1,择校到地市级高中=0)	-0.376*** (0.100)	0.066*** (0.023)	0.075** (0.035)
父母陪伴			0.082** (0.039)
学校选择×中考成绩标准分	0.223*** (0.082)		
中考成绩标准分	是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N	1 685	1 685	1 685
R ²	0.177	0.018	0.112

注:回归(1)基于模型(3),因变量为高考成绩标准分,回归(2)基于模型(4),因变量为父母陪伴,回归(3)基于模型(5),因变量为成绩增值;*,**,***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对上述两项回归系数进一步计算。在包含交互项的回归模型(3)中,高考成绩标准分对学校选择的偏导数表示留在县中对高考成绩的边际影响。结合表8回归(1)的估计结果,有:

$$\partial GK/\partial C = \alpha_1 + \alpha_2 ZK = -0.376 + 0.223ZK$$

令上式等于零,可得ZK=1.686。该数值为留在县中的边际影响由负转正的临界值。当县域生源学生的中考成绩标准分高于该临界值时,相较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留在县中能够获得更好的高考成绩。假设中考成绩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可以求出该临界值对应的累积分布概率为 $1 - P(Z \leq 1.686) = 0.0455$ 。该数值意味着,中考成绩排名在前4.55%的学生即是所谓的“大鱼”,留在县中这一“小池塘”就读是更优的选择。

2. 异地择校减少父母陪伴

县域生源学生由县到市的异地择校可能通过影响父母陪伴的路径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本研究采用两步回归法进行分析,结果见表8的回归(2)与回归(3)。回归(2)基于模型(4),为第一步回归。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66,显著大于0,说明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中能够获得更多的父母陪伴,相比较而言,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则减少了父母陪伴。回归(3)基于模型(5),为第二步

回归。父母陪伴的回归系数为0.082,显著大于0,说明父母陪伴有助于县域生源学生的学业进步。由两步回归结果可知,县域生源学生由县到市的异地择校会造成父母陪伴的减少,不利于择校生在地市级高中的学业进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县域生源学生由县到市的择校行为加剧了县中优质生源的流失,不利于县中的高质量发展。县域家长在为子女进行学校选择时可能陷入“好学校带来好成绩”的决策误区,倾向将地市级高中较县中更优异的高考表现归因于前者更高的教育质量,既没有意识到学生的学业基础、家庭背景也是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没有考虑择校可能给学生学业成就带来的消极作用。本研究基于J省高中学生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县域生源学生的学校选择效果展开实证分析,核心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相较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中在平均意义上更有利于学业进步。这一结果为遏制县中生源流失的政策努力提供了实证依据,一方面说明县域家庭择校到地市级高中的倾向确实陷入了误区,留在县中才是更好的学校选择;另一方面

也提示地市级高中相对更优异的高考表现极有可能来源于对优质生源的筛选,而非自身更高的教育质量。

第二,学校选择对县域生源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因学生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个体特征而有所差异。留在县中对县域生源学生学业成就的积极影响主要发生在相对优势家庭与文科学生群体中;但考虑到择校成本,留在县中也应是弱势家庭出身的学生与理科学生更优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留在县中对文科学生学业成就的积极影响更大,这并不意味着县中的文科教学质量较地市级高中更高;只能说明地市级高中在理科教学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县中的比较优势则在文科教学。

第三,“大鱼小池塘效应”的存在是导致择校到地市级高中效果欠佳的原因之一。这可能因为择校学生进入地市级高中后社会比较参照系发生变化、学业自我概念降低;也可能是因为县域生源学生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后显得“不够突出”,所能获得的教师关注与优质教育资源反而不及留在县中。“大鱼小池塘效应”的存在提示,学业基础较好的县域学生群体没有必要过分追求择校到地市级高中。

第四,父母陪伴减少同样是异地择校效果欠佳的原因。本研究发现,县域生源学生由县到市的异地择校通过降低父母陪伴子女的概率,对择校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发现提示家长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家长,“花钱”择校未必是家庭教育投入的有效形式,更不应忽视子女成长过程中父母陪伴的作用。虽然过往的择校研究较少涉及这方面,但聚焦家长到子女学校所在地“陪读”现象的研究却并不少见,[40]这些研究侧面佐证了父母陪伴对高中生学业发展的重要性,与本研究的发现同属一枚硬币的两面。

从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可知,规避决策误区后,县域家庭理性的学校选择应是留在县中就读。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旨在重塑大众对县中的信心,引导县域家庭走出误区、理性决策,遏制县中优质生源的持续流失。

第一,增加对县中的资源投入,强化地市级政府的资源统筹力度。本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个体、家庭等相关变量的条件下,县中县域生源学生的高考成绩仍低于地市级高中县域生源学生,县、市高中在高考表现上的差距客观存在。若想重塑大众对县中的信心,根本举措在于给予县中倾斜性的资源投入以加速县中教育质量提升。然而,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下,有限的县级财政难以有效支撑对县中的倾斜性投入。因此,建议参照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普通高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建立中央、省、市、县(区)多级共担机制,强化省市两级政府的资源统筹责任与地市级政府的管理责任。

第二,通过信息干预手段树立大众对择校效果与县中教育质量的正确认知。本研究发现,相较于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县域生源学生留在县中更有助于促进学业进步;尤其中考排名靠前的学生,留在县中能获得更好的高考成绩。政府、县域学校、学界应借助数据与真实案例,利用各类宣传手段与传播载体向社会大众特别是县域学生家长传递这一信息;增强县中教育透明化与可感知性,通过校园开放日、家长随堂听课等活动宣传县中的办学成绩、办学特色等;利用家长学校等场合展示异地择校的成本费用,进行学校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建立学校增值评价体系,构建县中学生“学业进步指数”,定期发布县中增值评价报告;利用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宣传县中学生所享受的高考升学政策优惠^①。^[41]

^① 以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为例,不论是国家专项、地方专项还是高校专项,均主要面向县域生源学生,要求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第三,打破“唯高考”、“唯升学”的评价倾向,鼓励高中多样化发展。过往研究发现,基础教育管理实践中存在按高考表现对公立高中进行绩效拨款的现象。^[42]这说明,地方政府在评价高中时也可能陷入与家长类似的误区。本研究分析发现,即使不排除个体与家庭因素的干扰,县中也可以在生源不占优的情况下取得较地市级高中高得多的成绩增值优秀率。地方政府应着力打破“唯高考”、“唯升学”的高中教育质量评价方式,将特色课程、师资建设纳入学校评价体系,引导县中聚焦科技、艺体、职教融合等方向,对高中实行兼顾办学基础与办学特色的增值性评价,支持并鼓励高中多样化发展。

第四,规范中考招生秩序,坚决制止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行为。本研究在剥离生源筛选因素后发现,选择地市级高中并没有给县域生源学生带来更大幅度的成绩增值,再次证明生源是影响高中学校高考表现的关键因素。遏制县中优质生源流失,须打破各类“精英高中”、重点高中对区域优质生源的垄断,禁止违规跨区域招生,确保县、市高中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竞争。具体举措上,各地中考招生方案应由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建立省级统一招生平台,实时监控生源异常流动;全面落实属地招生原则,确保“公民同招”;限制特殊招生比例,禁止以“创新班”、“实验班”的名义变相“掐尖”。

第五,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地市级高中的教育资源向县域延伸。县域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因此,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是化解县域教育困境的前提。^[43]集团化办学、联合办学、对口帮扶等方法可一定程度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一方面,应充分鼓励地市级高中联合县中建设教育集团、学校共同体,突破区县资源共享壁垒,吸引优质生源留在县中;另一方面,县中应借助地市级高中的帮助,通过教师培训、合作教研、跟岗学习、课程与教材联合

开发等方式,着力补齐县中在教师教学能力与课程教材资源上的短板。

第六,加强家校协同育人,引导县域学生家长合理选择家庭教育的投入形式。择校在中国情境中主要表现为家长对子女教育的货币性投入。然而,相较于货币性投入,家长在时间、精力、情感上的非货币性投入才是影响子女学业发展的主因。^[44]本研究发现,异地择校会通过影响父母陪伴的路径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负面影响。亲子沟通减少、父母对子女学习监督与良好学习习惯培养的削弱,本质上是减少时间、精力、情感等非货币性投入的结果。县域学校应在家校协同育人中发挥主导作用,纠正家长“花钱就能提高学习成绩”的错误认知,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以恰当的形式增加家庭教育的投入。

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一方面,针对“大鱼小池塘效应”的分析没有区分学生心理机制与教育资源机制;另一方面,针对父母陪伴问题,没有对陪伴种类(如父、母一方单独陪伴,双方同时陪伴)、方式(如养育陪伴、学习陪伴、情感陪伴等),以及陪伴时间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进一步研究可针对上述局限展开优化,亦可从样本区域拓展、异质性群体细分、影响机制挖掘、家长观念干预等方面着手,提升研究的深度与实践价值。

(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朱昱治对本研究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汪栋,等.县中塌陷的区域异质性、成因与政策治理路径擘画[J].教育发展研究,2023,(2).
- [2] 刘丽群,张文婷.振兴县中:何以必要及如何可能[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6).
- [3] 郭丛斌,林英杰.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校际差异的马太效应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4).
- [4] 吴秋翔.从“县中塌陷”到县中振兴:高考专项计划如何改变县中困局[J].中国教育学刊,2022,(2).
- [5] 郭丛斌,王家齐.我国精英大学的生源究竟在何方——

- 以A大学和B大学2013级生源为例[J].教育研究,2018,(12).
- [6] 林小英,等.被抽空的县级中学——县域教育生态的困境与突破[J].文化纵横,2019,(6);周秀平,杨玉春.县中振兴中的跨区域中考招生治理[J].教育学报,2022,(5);陈先哲,曾晓.嵌入城镇化进程的县域普通高中的塌陷与振兴——基于东中西5省6县的调查[J].教育研究,2023,(8).
- [7] 马莉萍,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新高考背景下优质高中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J].教育与经济,2024,(3).
- [8][29] 协天紫光.择校能否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教育与经济,2020,(6).
- [9] 杨明全.择校对中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国外实证研究的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08,(10).
- [10][11][18] Petra E. Todd, Kenneth I. Wolpin. On the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Cognitive Achievement[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3,(485).
- [12][24] James S. Coleman,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M].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6. 325.
- [13] 谢桂华,张阳阳.点石成金的学校?——对学校“加工能力”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2018,(3);祁翔,郑磊.生源效应还是学校效应?对上海公私立学校教育绩效的再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9,(6);姚昊,张莹.“筛选”还是“培优”:选择民办学校会取得更高的学业成绩吗?——基于PISA 2018中国四省市的分析[J].教育与经济,2021,(3).
- [14] 丁延庆,薛海平.高中教育的一个生产函数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 [15][38] 王骏,等.重点高中、学校投入与学生学业成绩——基于J市普通高中的一个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17,(3).
- [16] Thomas Dee, Xiaohuan Lan. The Achievement and Course-Taking Effects of Magnet Schools: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15,(47).
- [17] Kathryn Anderson, et al. Do Selective High Schools Improve Student Achievement? Effects of Exam Schools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40).
- [19] Herbert W. Marsh. Self-Concept: The Application of a Frame of Reference Model to Explain Paradoxical Results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84,(2).
- [20] 郭成,等.学业自我概念及其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06,(1).
- [21] 李振兴,等.学业自我概念发展中的大鱼小池效应[J].心理科学进展,2013,(5).
- [22] 孙晓雪.期望与现实:学生视角下学校不公平现象的生成机制研究[J].基础教育,2024,(3).
- [23] 高曼,朱敏.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相对排名对学生教育产出的影响[J].教育学报,2021,(4).
- [25] 顾天竹,等.子女教育投入:金钱和时间孰轻孰重[J].教育学报,2021,(4);王春超,林俊杰.父母陪伴与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J].教育研究,2021,(1);李汉雄,等.职住分离、父母陪伴与青少年人力资本发展[J].劳动经济研究,2022,(3).
- [26] 吴贾,等.父母工作时间的代际影响:基于城市和流动人口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分析[J].劳动经济研究,2019,(3).
- [27] 沈怡佳,等.父母学习陪伴与小学生学业不良的关系:亲子学业沟通的中介作用和学习负担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6).
- [28] 彭正秀,等.父母陪伴方式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省域内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基础教育,2022,(1).
- [30] 黎煦,等.寄宿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阅读能力的影响——基于两省5县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8,(2); Shutao Wang, Yaqing Mao. The Effect of Boarding on Campus on Left-behind Children's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Chinese Evidence from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8,(3);秦敏,朱晓.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19,(3).
- [31] 李波,黄斌.破解教育生产“黑箱”:教育生产函数研究的评述与展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9).
- [32] 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3).
- [33] 谢爱磊,等.县域高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的高等教育期待——基于粤东西北“县中塌陷”问题的调查[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2,(4).
- [34] 纪春梅,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初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心理弹性和学业自我概念的链式中介作用[J].教育与经济,2023,(4).
- [35] 李向辉.中小学校园隐性伤害行为及其规避[J].教学与管理,2010,(28).
- [36] 雷望红.我国县中发展的运行逻辑与振兴道路[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6).
- [37] 王骏,孙志军.重点高中能否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基于F县普通高中的一个断点回归设计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4).
- [39] 王新凤.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基于大型问卷调查数据[J].中国考试,2024,(9).
- [40] 陈乐.陪读:从乡野到庙堂的穿越[J].中国教育学刊,2021,(3);齐薇薇.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视角下母亲陪读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1);范云霞.高考陪读社区:教育生产联合空间的形成——基于毛镇的田野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3,(2).
- [41] 郭丛斌,等.教育帮扶政策对脱贫县顶尖大学录取机会的影响——以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25,(11).
- [42] 伍银多,等.高考表现与教育经费投入:问责制度下公立高中的“绩效拨款”现象[J].教育与经济,2017,(3).
- [43] 鲍传友.县域教育面临的困境与系统治理[J].人民论

坛,2024,(10).

[44] 李佳丽,何瑞珠.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青少

年发展: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阐释[J].中国青年研究,

2019,(8).

The Misstep an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Choice by Families from County-Level Areas amid the Dilemma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Senior High Schools

Guo Congbin, You Zhenlei & Wu Yuchuan

Abstract: County-level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s serve as a crucial pivotal for facilita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within counties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However, prone to falling into decision-making pitfalls when helping their children to choose senior high schools, many families from county-level areas blindly help their children to choose to study in prefecture-level senior high schools, thereby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d outflow of high-achieving students from county-level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s, which is detrimental to the objective of "revitalizing county-level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s." Based on a sample survey of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J Province, China,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chool choice by students from certain county-level area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n average, those students choosing to study in county-level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s experienced greater academic improvement, compared to those choosing to study in prefecture-level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choice to study in county-level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s is primarily observed among students from advantaged families and those arts-focused students. Also,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due to school choice exert a negative effect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a result of the existence of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 and the decrease in parental companionship. To guide families from county-level areas towar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dispel misconceptions, and curb the continuous outflow of high-achieving students from county-level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s, we need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esources, influence public perception, optimize school evaluation, regulate student recruitment, integrat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county-level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 school choice;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 parental companionship

Authors: Guo Congbin, senior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Key Research Institute in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You Zhenlei, doctor of educatio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Wu Yuchuan,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yewu@pku.edu.cn, Beijing 100871)

[责任编辑:陈 枫]